

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

中日关系的 历史轨迹

王勇：天台入唐僧与书籍之路 / 吴玲：9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 / 方琳琳：从律令制角度看日本衣服令 / 董科：平安时代前期疫病初探 / 半田晴久：日本史中的人宋僧 / 陈小法：汉语词汇在中世日本变例之研究 / 江静：无学祖元赴日传说的若干问题 / 张新朋：《禅林墨迹》读札

王勇 编著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王勇
编著

中日关系的 历史轨迹

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/王勇主编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10. 12

(中日关系史研究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326 - 3049 - 3

I. 中... II. 王... III. 中日关系—国际关系史—文集
IV. D829. 313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5012 号

责任编辑 邬曼菁 李 纳
装帧设计 杨钟玮

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海辞书出版社
(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 ewen. cc www. cishu. com. cn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5.5 字数 387 000

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3049 - 3/K · 695

定价: 48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联系电话: 021—36162648

序：日本文化研究所创业简史

回顾本所的创业史,光隶属大学就“一波三折”:研究所创办于1989年,当时取名“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”;1998年杭州大学并入浙江大学,研究所随之更名为“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;2004年主要成员分批离开浙江大学,重新组建后称“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。

一、杭州大学时期

杭州大学时期属于草创时期,当时在校内被戏称为“三无”机构:无专职编制、无办公经费、无固定场所。我这个主任经常到处借空屋接待来客,诸如邮寄信件、复印资料、购买书籍等,一概自掏腰包。

改革开放以后,浙江的民营企业、乡镇企业发展神速,对传统的计划经济形成巨大冲击。这股风也透过门缝刮进校园,搅得书生们心绪不宁。一方面是吃惯大锅饭的传统研究机构经费缩水,度日维艰;另一方面经济、法律、外语等走红学科备受青睐,却无法在死板的科研体系中占得一席之地。

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是一位很有魄力的学者型管理者,他大概参照了在商品经济洪流中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模式,允许各学科教师自由组建研究机构(当然要履行一系列手续),但学校不给予编制、经费、场地支持,任其优胜劣汰。

一时间,校园里各种名目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“日本文化研究中心”也是其中之一,但是属于比较异类的。有人质疑:“日本没有文化,研究它干吗?”有人告诫:“很多研究机构有企业撑腰,你搞的冷门撑不了多久。”风言风语虽多,我当时铭记的是沈善洪校长的一席话:“给你五年时间,如果成绩卓著,脱颖而出,可以考虑给予独立编制。”

五年一晃眼过去了,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连续五年申请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项目,同时申请到国家教委课题两项、浙江省社科基金课题一项、日本野村财团课题一项,并与日本山口大学合作申请到日本文部省课题两项,累计申请课题十一项。此外,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六次(其中四次与日本神奈川大学共同举办),出版著作十一种(其中王勇主编的《中日汉籍交流史论》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)。鉴于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创办以来取得的突出成绩,1993年6月被浙江省教委指定为省级研究机构。

沈善洪校长没有食言,记得是1994年10月召开的党政联席会议上,让我去汇报、陈述,当场拍板升级为具有独立编制的研究所,定编三人(我从外语系要了王宝平任副所长、从后勤部门要了胡细做行政秘书),从新建的“邵逸夫科技馆”中拨出约50平方米作为办公场地。研究中心自此摘掉“三无”帽子,更名为“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”,而且有了专职编制和固定场所,但学校依然不拨办公经费,所以还是个“国有民办”机构。

此后五年,研究所步入快速发展时期。有关中日书籍交流的国际会议、合作研究,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。尤其是代表研究所最新成果的《日本文化研究丛书》(杭州大学出版社)、《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》(浙江人民出版社)、《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》(日本大修馆书店)陆续推出,在日本学研究领域占据了一个制高点。

这一时期,研究所的“专门史(文化史)”硕士点门庭兴旺,报考者来自全国各地;同时还与外国语学院合作申报了“日本语言文学”硕士点,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后备研究力量。1997年杭州大学科研处对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机构进行首次综合评估,在数十个研究机构中,日本文化研究所脱颖而出,获得唯一的一个满分。

现在回想起来,杭州大学时期创业异常艰辛,但留下甜蜜的回忆。艰辛,是因为从“三无”到“一无”,日常办公、设备添置、外事活动诸经费,均从个人课题费中抠出来,现在放在浙江大学的几个书架,就是王宝平教授从家里搬来捐赠的。甜蜜,是因为有领导的人文关怀,有杭州大学重视文科的传统。

在艰辛中品出甜蜜,这就是杭州大学的魅力。

二、浙江大学时期

岁月如流,转眼到了1998年9月,中国高校史上惊天动地的改革,在杭州付诸实施了。杭州大学、浙江医科大学、浙江农业大学并入浙江大学,对此举措舆论褒贬不一,是非功过只能留待历史来定论了。

经过杭州大学黄金十年的磨炼、扩展,此时日本文化研究所兵强马壮,专职人员达六名(含行政人员一名),其中教授三名、副教授一名、讲师一名;加上十余名硕士生、数名博士生及博士后,形成一支齐整、强大、团结的科研梯队。

“四校合并”后,浙江大学跃升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,以国内顶级名校姿态高调亮相,引起社会广泛关注,可谓机遇与挑战几乎同时出现。我们研究所最初看好新一轮博弈,相信自身的实力和拥有的资源,企望在“新浙大”这个前所未有的大舞台上有所作为。因此制定了详细的五年发展规划,主要内容是:加强国际学术交流,力争与世界主流学界接

轨,打造国内一流日本研究基地。当时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认定南开大学、复旦大学为中国南北两个研究基地(日语称“据点”),我们研究所经过十余年努力,普遍认为离“基地”仅一步之遥,借助“新浙大”东风,完全可能实现夙愿。

这里附带说明一下:在浙江大学的大部分时期,全所五名教师均为留学归国学人,“海龟”们利用在外国学术界的丰富资源,引进国际合作项目,招收国外研究生,输送所有博士生和部分硕士生出国留学,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担任客座教授。可以说,留学归国学人在国际化进程中属于强势群体,仅输送研究生出国留学的比例和国际合作课题经费,就大概稳居浙江大学文科首位,因此各方一度均看好研究所发展前景。

然而,世事难料,造化弄人。“四校合并”后的最初遭遇,把我们美好的愿景打消了一半。事情原委是这样的:原浙江大学(俗称“老浙大”)是一所理工科大学,“四校合并”之初,按照工科模式实行“系所一体”,日本文化研究所一直隶属校科技处,这下没有了着落。大约有半年多时间,一会儿传闻把我们并入外国语学院,一会儿又听说将我们落户于人文学院,更多的消息说日本文化研究所将被撤销,教师分流到各系。在惴惴不安中度日如年,最终还是流着杭州大学血脉的人文学院收编了我们。

从表面上看,浙江大学高举“争创世界一流”的旗号,积极鼓励开展国际学术交流,其实这里面有个误区。比如,浙江大学与海外高校交流时,非常讲究档次和级别之类,尤其是建立校际交流,那必定得“门当户对”。我们在杭州大学时期,先后促成日本四所大学签订交流协议,可是浙江大学认为规格不高均不予承认。我们在杭州大学黄金十年期间构建的国际交流网络,就这样瘫垮了。

国际交流确实需要某种对等条件,但也得视具体情况而定。有些海

外大学虽然规模较小,但部分学科却世界领先;相反浙江大学虽然跻身全国前列,但有些学科在国内还进不了三流。所以过分拘泥“门当户对”,有时会错失良机,甚至闹出些笑话,具体例子就不便说了。

日本文化研究所作为一个三级学科机构,在浙江大学推行的学科整合中,自然成为牺牲品(如定编教授名额只有一个等)。值得庆幸的是,我们虽然被逐渐边缘化,但全所上下同甘共苦,致力于营造良好的小环境。此外,名校毕竟不同凡响,不仅充分给予教师自主性,而且其无形资产也弥足珍贵,因而两个硕士点连年生源充足,而且开始培养博士生和博士后,打造出一支过硬的学术梯队。

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,浙江大学时期虽然心情不畅,但个人的科研成果却大多最为丰盛。这是得益于杭州大学时期打下的基础?还是应该感谢浙江大学时期的巨大压力?

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,这就是在浙江大学的遭遇。

三、浙江工商大学时期

“四校合并”造成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,据说接近“文革”水平,书生怎堪如此折腾?于是教师队伍开始动摇,甚至出现雪崩式的人才外流。浙江大学对此似乎早有准备,2003年前后推行“吐故纳新”工程——只要本人提出申请,无论你是助教还是教授,人事部门现场办公,立等可取。原杭州大学教师大批出走,日本文化研究所教师也乘势各寻生路,有回流海外的,有另找娘家的,创办十五年的研究所,似乎一夜之间散伙了。

然而一个偶然的机遇,我们与浙江工商大学胡祖光校长邂逅,向他吐露报国无门、理想难成的苦衷,他当即表示:你们有多大的能力,我就提供多大的舞台。这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交谈,胡祖光校长对学者的

体恤、对文科的理解、对国际交流的鼓励,让我们从浙江大学的孤独无援中找回杭州大学时期的甜蜜感受,激起我们第二次创业的激情。王勇教授、王宝平教授毅然辞去国外大学教职回国,一批志同道合者重新聚集起来。

浙江工商大学为了接纳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的整体迁入,并考虑今后发展的空间,于2004年7月新设“日本语言文化学院”,日本文化研究所作为校级研究机构隶属于学院。如此,日本文化研究所绝处逢生,在新环境下寻求发展机遇。

转眼五年过去了,似乎又到了一个轮回,研究所现状如何呢?客观地说是喜忧参半,我们先说正面的。首先,由于依托日本语言文化学院这个平台,得以不断引进优秀人才(包括外国籍专职副教授),研究梯队迅速扩张,目前研究所成员达到十三名;由于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,梦寐以求的“日本文化研究楼”今年终于落成,加之图书资料的快速增加,研究所的硬件设施堪称国内一流;研究所十余年来不懈地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申请“海外日本研究基地”,也于2006年获得通过,从而中长期的科研经费得到确保。

然而,任何事情总会有正反两面,比如杭州大学时期虽然面对“三无”政策,但人文关怀体贴入微;浙江大学时期虽然沦为边缘,但名校气度允许研究所自主发展;浙江工商大学时期,虽然物质条件比较优厚,但研究所失去了所有的专职编制,似乎又轮回到第二个五年时的“一无”时代——所不同的是,以前没有经费,现在没有编制。

浙江大学时期成型的运营模式,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状况了。在日本语言文化学院的框架下,所有的成员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日语教师,研究所只不过是自愿结合的松散的虚体机构。然而,令人欣慰的是,虽然难以达到浙江大学时期专业机构的科研水平和人才标准,但研究所吸引了众多教师来初窥学术门径,或许可以期待将来年青一代中有人脱颖

而出。

回眸历史，瞻望未来，任重而道远。二十年来虽然沧桑巨变，但我所坚持“立足本地，放眼国际”的宗旨不变；虽然作为一个研究机构，我们大概已经完成了应有的使命，但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这份遗产可以由本论文集集中的每一位作者来发扬光大。

王 勇

2009年5月28日

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

目录

序：日本文化研究所创业简史	1
上编 隋唐至宋元	
王勇：天台入唐僧与书籍之路 ——以国清寺为舞台的书籍交流	3
吴玲：9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	29
葛继勇：日本古代的国史编纂机构及人员构成 ——以《日本书纪》为中心	48
李美子：从日本文献看渤日间的贸易	65
[日]水口干记：“书籍之路”概念再考 ——王勇说的批判性继承	77
方琳琳：从律令制角度看日本衣服令	92
董科：平安时代前期疫病初探 ——以“六国史”中记录为中心	112
[日]半田晴久：日本史中的人宋僧 ——平安时代史之再探讨	128

中日关系的历史轨迹

郝祥满: 齋然来宋求法的文化背景	164
郭万平: 僧商互动: 以日本僧成寻与明州商人陈咏为中心的考察	202
江静: 无学祖元赴日传说的若干问题	213
张新朋: 《禅林墨迹》读札	237

下编 明清及近代史

陈小法: 汉语词汇在中世日本变例之研究 ——以入明僧策彦周良的日记《初渡集》为例	249
任萍: 《华夷译语》考略	260
陈越: 明朝接待制度中的翻译人员 ——以日本来使策彦周良的《初渡集》为史料	271
郑洁西: 万历二十一年丰臣秀吉中毒毙命误传考	284
王宝平: 明治前期中国人绘制的日本地图 ——以《日本环海险要图志》为中心	298
吕顺长: 高田早苗对中国教育的考察及认识	319
孔颖: 清末日本监狱专项考察之研究	337
王力: 幕末明治初期日本的中国经济调查	357
章小丽: 清末中国人编译的日本法律辞书	374
[日] 福田忠之: 清末江苏省常熟的地方自治思潮与留日学生 ——《徐兆玮日记》相关内容述评	391
林琳: 论清代通俗小说中的日本人形象	415
许海华: 吴汝纶赴日考察始末	445
王坤: 《日本评论》及其日本文化研究	459
附录: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培养的硕士研究生一览表	479

上 编

隋唐至宋元

天台入唐僧与书籍之路

——以国清寺为舞台的书籍交流

王 勇

日本承和六年(838年)成行的遣唐使,作为唐代中日使节往来的收尾之作,具有多元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。随同使团入唐的天台僧圆仁,因撰著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而名垂青史;然而他还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,即携带日本天台宗的疑问请求唐人解答,在天台宗开创者智顓灵前供奉日本皇室的祭品,抄写日本所缺的佛教书籍等。

本文聚集于此项特殊使命,考证出圆仁的使命系受天台座主圆澄托付,而圆澄则为完成开山最澄的“遗命”,汇总本宗教义疑问三十条遣使入唐“请决”;圆仁受托拟赴天台山国清寺寻访名师,但其赴国清寺寻师请益未获唐朝敕准,于是将使命托付给同船入唐且获准留学的圆载。

圆载在履行这一使命的过程中,与当地官府、佛教界、民众广泛接触,期间产生多种传存至今的唐代珍贵文献,包括《维觶书状》、《唐决集》、《圆澄问广修答》、《圆澄问维觶答》、《义真问维觶答》等)、台州刺史滕迈的《书状》及《判印》、圆载写并跋《法华经五百问论》、唐人写经《金光明经》残卷等。上述中国失传而日本留存的文献史料,是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。

一、最后的遣唐使

延历二十三年(804年),以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的第十八次遣唐

使，横渡沧海出使唐朝。延历年间的遣唐使之行，不仅促成最澄和空海从中国传回天台宗与真言宗，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不灭功绩，同时也为桓武天皇的治世增添了丰富的国际色彩。

延历年间的遣唐使带回的一系列成果，从各种意义上评估均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。或许咀嚼消化这些丰硕成果所需的时间远远出乎意料，所以此后的嵯峨与淳和两代天皇，均未再见遣唐使动议。天长十年（833年）二月，淳和天皇让位，仁明天皇登基，次年正月改年号为承和元年。可能就在仁明天皇即位后不久，时隔前次遣使约三十年，日本朝廷才开始考虑选派遣唐使之事。

据《续日本后纪》记载，就在刚改元后的承和元年（834年）正月十九日，朝廷下达了遣唐使的人事任命。即决定“以参议从四位上右大弁兼行相摸守藤原朝臣常嗣为持节大使，从五位下弹正少弼兼行美作介小野朝臣篁为副使”，此外遴选判官四人和录事三人；紧接着二月二日，任命造船使与装束司；继而于三月十九日，肥后守粟田朝臣饱麻田吕奉旨，偕大宰府唐人张继明入京。这一连串的举动说明，不仅人事、海船及装备等处于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，就连信息收集工作也毫不懈怠。

进入三月，朝廷接连颁布与遣唐使渡海相关的指令，如承和二年（835年）三月十二日，敕令大宰府为“遣唐舶不虞之备”，预先储备“绵甲一百领、胄一百口、袴四百腰”。遣唐使出行的物质条件，就此基本完备，接下来还有些宗教祭祀及朝廷仪式。

承和三年（836年）二月，依据惯例，为祈祷遣唐使往返平安，举行了一系列祭祀活动。首先天皇于一日在北野祭拜天地众神。继而七日由遣唐使等在贺茂大神社奉上币帛。祭祀活动告一段落后，接着于九日，天皇在紫宸殿召见大使与副使，并对遣唐使各等人员赏赐如下：

赐大使彩帛百匹、绀布二十端，副使彩帛八十匹、绀布十端，判

官及准判官各赐彩帛十五匹、赏布六端，赐录事彩帛十匹、赏布四端，知乘船事与译语各赐彩帛五匹、赏布二端，还学僧各赐彩帛十匹。^[1]

四月二十四日，天皇再次于紫宸殿召见大使与副使，举办送别宴席。二十九日赐节刀于大使与副使。之后，遣唐人员分乘四船，于难波港待命。

《续日本后纪》承和三年(836年)五月十二日的记录中有“鸳鸯飞来，双集弁官东厅南端”，朝廷以此为吉祥之兆，派遣藤原助衡到难波的海口，向遣唐使传达诏令，敦促其尽快张帆起航。次日，出航准备皆完备，十四日四船联袂驶向博多湾。

七月二日，遣唐使船队自博多出海，不久遇风吹回，船体受损严重，不堪继续远航。于是，大使与副使暂回京都，将节刀奉还天皇。承和四年(837年)七月，经过休整的船队试图再次出航，却因逆风相阻，再次以失败告终。承和五年(838年)六月，第三次起航终于成功。自承和元年的人事任命算起，时光已经流失四年有余。这仅仅是序曲而已，当年遣唐使渡海之艰辛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承和年间的遣唐使，是实际成行的最后一批遣唐使。作为遣唐使事业的收笔之举，对它进行的探究可以是方方面面的。其中，追溯圆仁与圆载的坎坷命运，对于研究日本佛教史特别是日本天台宗的历史有重要意义。

本文以中国浙江省的天台山国清寺为舞台，聚焦于颇富传奇色彩的日本人唐僧圆载，通过追踪他的写经、求书等活动，揭示唐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。

[1] 《续日本後紀》卷五“承和三年(836年)二月九日”条。